

壹、前言

在臺灣開始民主化前，地方派系被視為國民黨在地方上的統治動員工具，藉以為此「外來政權」增加統治正當性。因此，在民主化前的臺灣，地方派系的重要性在臺灣政治發展歷程中實不容小覷。

誠如吳重禮（2002）所言：「近十餘年來，我國社會科學界相當熱衷、或者經常被提及的研究主題為何，答案可能是派系政治」，諸多的期刊論文、碩博士論文均以此做為題材。而在派系政治的研究中，對於地方派系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棟，導致其研究發展上也如同吳乃德認為的「愈來愈細緻繁瑣，愈來愈像新聞報導；第二是高度的重複，許多研究只是用新的地區，蒐集新的材料，只是證明早已有的論點」（王金壽，2004a），而無法突破舊有的理論框架。不過也由於其存在的樣態眾多而難以定於簡單的理論框架，致使地方派系的議題在學界的研究中相當難以取得共識。綜觀過去 20 年的研究發展，對地方派系的研究往往並非以派系政治做為主軸，而是將其鑲嵌於其他議題來研究，諸如威權統治模式、社會網絡、組織動員、政治民主化、政黨運作與競爭等（吳重禮，2002），而其在研究途徑上的分歧不外乎是從對派系的定義、運作模式、目的等問題意識而產生。

縱然如此，過去的研究在途徑上仍可簡略區分為「恩庇侍從」（patron-client）及「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兩種型態。做為文獻評議的本文，將針對此兩種型態的地方派系研究的理論途徑進行區分及回顧，試圖分析臺灣在地方派系研究文獻上的觀點與異同，並進一步討論發展已久的兩種理論途徑，在觀察經歷民主化與兩次政黨輪替後的臺灣是否仍然適用，或有何不足之處？若無，則地方派系的研究又必須深入觀察哪些方向？藉此對於地方派系研究上「愈來愈細緻繁瑣」、「只是證明早已有的論點」此等無法突破舊有理論框架的現況，提出值得後續進一步討論與建構理論的議題，以及值得觀察的方向，但並不試圖提供理論假設的建構。

貳、臺灣地方派系研究的核心途徑

如前所述，臺灣在地方派系的研究上大致可區分為「恩庇侍從」及「社會網絡」兩種途徑（吳重禮，2002，頁 93）。前者如王金壽（1997，2004a，2004b，

2006a, 2006b)、陳明通(1995)、趙永茂(1998)、Wu(1987)等人為主，主要認為地方派系為國民黨在動員上的助力，因而較注重於派系與國民黨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如何藉由政黨給予派系經濟資源，而派系提供政黨政治利益、協助國民黨進行統治權上的鞏固，偏向於經濟學視角的分析；後者則以陳介玄(1994)、Bosco(1992)、Jacobs(1980)為主，分析時偏向解釋地方派系的形成、社會基礎及其意義，甚至是派系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偏向社會學視角的分析。

雖然吳重禮(2002)提出引入美國「機器政治」的研究途徑，進而衡量領導菁英的自利動機，探究派系領袖滿足權力控制的心理動機、瞭解派系的組織利益與領導菁英的個人利益，並分析兩者間的落差。然此途徑至今仍少有深入研究，故在此僅針對文獻與理論均較為足夠的「恩庇侍從」及「社會網絡」兩種途徑提出討論，藉此引發國內學界對於理論薄弱之處有更多的討論。

一、恩庇侍從主義

然而，究竟何為地方派系呢？雖然由於「各地經濟社會乃至政治情況，以及人物性格、作風、遭遇之不一，故派系產生之原因可謂經緯萬端，不能一概而論」(趙永茂, 1978)，但以其存在的形式主要可引述陳明通(1995)提出的看法：「派系是一種『二元聯盟』(dyadic alliance)，為達成公部門或準公部門資源取得及分配的集體目標，所建立起來的一套多重人際網絡」。在二元聯盟中，占優勢的稱為「酬庸者」(patron)，而弱勢的一方則為「隨從者」(client)；此種垂直二元結盟關係則被稱之為「恩庇侍從主義」，而這樣的概念必須強調「交換」的重要性。

在臺灣的地方派系研究中，吳乃德(Wu, 1987)為探討恩庇侍從主義的先驅，透過討論國民黨政權做為一外來政權，究竟如何藉由與地方派系建立關係，並鞏固其政權的穩定。吳乃德認為由於國民黨戰敗來臺，為求取穩定而希望抑制組織性活動，卻又想藉由開辦地方選舉來攏絡民眾以獲得統治正當性，於是，國民黨選擇採用「中央—地方分隔的雙重菁英結構」，並進而將其區分為官僚侍從主義及選舉侍從主義兩種型態。然而，不論如何進行定義，此種模式均指涉透過寡占性經濟利益的交換來獲得派系的政治支持及選舉期間的動員、買票。值得注意的是，在國民黨與派系共生的時期，其仍將地方派系侷限於縣市層級，並藉由扶持兩個以上的地方派系來穩固制衡與競爭的機制。根據陳明